



韩江狂澜

川流著

兴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韩江狂澜

川流著

兴宁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编
一九九八年十月

出版说明

本书作者以自己的亲身经历，揭露了解放前国民党政府的残暴，控诉了法西斯特务虐杀革命人民的罪行，戳穿了他们昏庸无能的丑恶嘴脸；同时讴歌了革命人民在复杂的情势中，不为威屈，不为利诱，坚持真理，战斗不息，英勇献身的斗争精神。这些，对年青一代进行爱国主义教育和革命传统教育，将会有积极的作用。

书中所记述的一切，都是真人真事，生动翔实，感人至深。它不但可作为党史工作者的重要参考资料，也是一部值得一读的报告文学作品。因此，我们决定把它出版，以飨读者。

(编者于1998年10月)



作者川流

1948 年在汕头

作者简历

川流，原名王道生，广东省兴宁市人，1913年生于农民家庭。早年在上海新华艺术专科学校学习西画，1932年起，历任中学校长、教导主任、县文教科长、新加坡《南洋商报》和曼谷《中原日报》驻汕头通讯记者、《兴宁县志》编辑等职，著作有《时代的牺牲者》、《前夜集》、《黎明之前》、《韩江狂澜》等。《前夜集》于1994年10月被推荐在北京首届九十年代新诗集展览会上展出，发给荣誉证书一份。其名字被编入《跨世纪中华文艺人才大典》。现年86岁。

《韩江狂澜》读后

雪 丁

20 世纪上半叶是风云变幻的伟大时代。

1917 年苏联十月革命的胜利；1919 年点燃“科学·民主”之火的“五四”运动的兴起；1921 年中国共产党的成立；1925—27 年大革命潮起潮落；1931 年日本侵略我东三省的奇耻大辱，这些活生生的历史事件，唤醒了千千万万热血青年，他们团结在以鲁迅为旗手的反帝反封建爱国主义的新文化运动大旗下，怀着纯洁高尚的革命浪漫主义和英雄主义情操，高歌猛进。他们甘愿受炼狱之苦，縲绁之灾，以艰苦为荣，以战斗为乐，从事正义的革命事业，要把灾难深重的旧中国改造成为民主自由一片光明的新中国。

当时，正值二十青春年华的川流先生就是这群热血青年中的一员。

“嚶其鸣矣，求其友声。”经过长期的试炼和不倦的探索，川流先生终于找到了共产党。“娘呀，我如今已不是你私有的儿郎，我要做一个被侵略祖国的孝子，娘呀，你也应该欣慰吧，你毕竟有一个献身于伟大事业的儿郎”（川流先生诗句），从此走上了正确的人生道路。一想到自己已加入这革命先锋队，要把旧世界打得落花流水，要把新世界建设得光明灿烂；一想到党领导的抗日战争正在北方、南方解放区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他就夜不能寐，更加勤奋地学习党的指示，更加积极地散播革命火种，提高群众政治觉悟。在兴宁，在大埔、在连平，受他影响的革命青年纷纷走上革命武装斗争的最前线。

然而，由于敌探的告密，叛徒的出卖，他和他的一些革命同事被国民党当局逮捕了。从此给他和家庭带来无穷无尽的磨难。在千里转解的行程中，他戴着脚镣手铐，背负沉重的行李，在狱吏的呵

喝声中，翻山越岭，从一个监狱走向另一个监狱。

是什么精神支持着他？我想起了他介绍我读过的苏联名著《铁流》、《毁灭》、《十月》，夏衍改编的话剧《复活》和其他进步书刊。就是那些作为西伯利亚囚徒的俄罗斯布尔什维克以及方志敏、瞿秋白等烈士的战斗精神支持着他。他和世界上许许多多无产阶级战士为了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全人类的解放而被捕下狱，这是何等光荣，何等豪迈！

可是，当他历尽千难万险，被折磨得遍体鳞伤，虎口余生从监狱出来以后，却找不到组织，这是比肉体生命还要宝贵的政治生命呀！往日一些志同道合的同志都已风流云散，而一些“熟人”，见了面，不是回避，就是冷眼而视。

因进行革命的地下工作被反动派逮捕下狱，这不是他的错。

怀着远大的革命理想，准备出狱后起来再干，而在敌人屠刀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这不是他的错。

响应党的号召，“助党整风”，作为一个过来人，为了对党对人民负责，向掌权者提了意见，这不是他的错。

可是，他过去的革命工作不但不被承认，反而变本加厉地被戴上“右派”帽子，给个“清洗回乡”的处置，让他自生自灭了。

“让暴风雨来得更厉害些吧！”

川流先生的遭遇具有典型性，他决不是孤独的。

既然在参加革命之初，就把一切都交给了党，既然愿意为人民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包括家庭幸福，儿女柔情，物质享受，那么，革命胜利后，人民能过上温饱的生活，就像杜甫在其《茅屋为秋风所破歌》里所唱的“死亦足”矣！过去的劳绩，就是对人民的贡献吧！而退居乡野，蔬菜自甘，“不求闻达于诸侯”，也是应有之义，人生的终极意义殆不过如此。

祝川流先生健康长寿。

1998.9.18，于广州

（作者雪丁是广州师范学院著名教授、化学专家。）

前 言

1942年6月6日，在广东省大埔县高陂镇发生的南委事件，是国民党法西斯特务继皖南事变后又一次对中共地下革命机关疯狂破坏的事件。我当时在大埔高陂中学担任校长及从事地下革命活动，事件发生时，与张文彬、涂振农、王亚华、丘鸿耀、杜国宗、蔡选英等同志在高陂同时被捕。我经历了一年又七个月的暗无天日的牢狱和集中营的非人生活，受尽残酷折磨，至1944年1月才获释出狱。到今天，据我了解：在南委事件中被捕的同志都已英勇牺牲或折磨致死了，我是亲历了南委事件始末的唯一幸存者。我不能忘记我和在南委事件中被捕同志所受的种种迫害；我也不能忘记在南委事件中被捕同志所表现的顽强斗争精神；我更不能忘记国民党法西斯特务对革命人民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几十年来，我养成了写日记的习惯，即使在最黑暗的牢狱中和集中营里，在特务和狱卒的监视下，我也利用一寸多长的小铅笔和大便纸，秘密地写下了日记提纲，出狱后再追忆补记完成。我几乎保存了在南委事件中的全部日记。现在把这些真实的记录公开出来，让我们这一代和子孙后代认清国民党的反动本质；认清他们对中国革命事业的摧残破坏和对革命人民的残酷迫害；永远牢记他们的滔天罪行，永远不能让他们再在我们的国土上出现。

历史的真实是客观存在的，任何人也不可能歪曲和篡改。为了保存历史的本来面目，这些记录，我只改动了一些人物的称谓和个别的字句。在这些记录里，真实地反映了解放前的黑暗年代和人民的苦难和斗争，无情地揭露了法西斯统治者的反人民暴行。在这里面，有我的控诉和抗争，有我的屈辱和痛苦，也有我的坚定信念和对未来的期望。我不掩饰自己的错误，也不夸大和缩小它。一切实事求是，寻源存真，是非功过，就让人们去评判吧！

(1990年6月于兴宁石马中学)

目 录

出版说明	编 者
《韩江狂澜》读后	雪 丁
目 录	
前 言	
第一章 韩江边晴天霹雳	(1)
第二章 惨人寰埔城监狱	(11)
第三章 负重行千里转解	(41)
第四章 鬼门关入死出生	(68)
第五章 集中营徒劳感化	(80)
第六章 离虎穴胜利归来	(127)
后 记	(130)
附 录 满庭芳	廖达人 (133)
编后语	编 者 (134)

第一章 韩江边晴天霹雳

我是一个贫苦农家出身的知识分子，早年接受了马列主义革命思想，迫切要求进步。1938年11月，在兴宁由张直心同志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1939年2月，经组织同意，我由友人介绍到大埔高陂中学担任社会服务部主任，第二学期改任教导主任，第二年开始担任校长。至1942年6月我在南委事件中被捕前，一连在高陂中学工作了三年半。

1939年2月，我来到高陂中学后约一个月，组织上把我的组织关系介绍到高陂来，安排我和高陂市立小学的党员教师廖秋声、丘奇二同志成立一个党团支部，廖任支书，丘任组织委员，我任宣传委员，负责领导当地的抗日救亡工作，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在群众中提高党的威信，扩大党的影响。

1940年开始，国民党发动了第一次反共高潮，时局逆转，组织上认为我担任了中学校长，工作岗位十分重要，叫我独立工作，不再参加支部生活，不与任何党员发生横的组织关系，以免暴露政治面目。组织上指定校中的事务员李泮水做我的交通员，通过他和大埔县委保持联系。1940年秋，时局进一步逆转，廖秋声、丘奇二同志经组织决定，离开高陂，转移到别处工作去了。

1941年，抗日战争进入更艰苦的阶段，国民党发动了第二次反共高潮。一月间，皖南事变爆发，震惊中外。我在高陂中学工作了两年，早已引起反动派的注意，幸得我利用了有一定友谊，又是同乡、同宗、同学关系的国民党大埔县党部书记长王倬汉的掩护，当地反动分子还不敢对我下手。同年2月，大埔县委书记黄芸介绍了黄冷柏、张秀隐、林英、温健君四位同志来我校工作。3月下旬，黄芸同志又征求我可否设法安置一位患肺结核病的老同志来我校休养。我为了完成上级交下的任务，毫不考虑个人安危，把这位

老同志接受下来。组织上没有告诉我这位老同志的姓名，年龄和党内职务，我给他化名王念之，假称是我上海读书时的一位同学的哥哥，安徽人，因家乡沦陷，流亡到了南方，听到我担任高陂中学校长，特来相依。校内外人士信以为真。正好这时，女教师张秀隐生了女孩，便安排他代授历史课。经过几个月的疗养，他恢复了健康，于同年8月离开学校，重返工作岗位去了。

1941年12月13日，大埔县委书记黄芸（已调任南委联络员）在大埔流动工作中被捕，至1942年1月22日，竟被反动派秘密杀害于大埔县城外狮子口韩江岸边。全国时局不断逆转，党的地下工作更为艰苦。1942年6月6日（农历4月23日星期六），南委事件便好象韩江上一股狂澜，普天盖地呼啸袭来，顿时，大埔高陂大地陷入了沉重的灾难……

1940年冬，中共中央为了便于加强对南方各地党组织的领导，于1941年春节，南方工作委员会（简称南委），由方方、张文彬、涂振农、王涛、郭潜等五人组成。方方为书记，张文彬为副书记，郭潜为组织部长，涂振农为宣传部长，负责领导江西、粤北、粤南、三个省委和湘南、桂林、闽西、闽南、潮梅、琼崖等六个特委的工作，设有秘密电台，可直接和延安党中央保持联系。南委成立后，为了避免暴露，从黄沙辗转迁徙到恭洲、高陂，最后于1941年9月迁至离高陂50多里的大埔角，在那儿开设了一间天成杂货店。方方化名王子华，公开身份是天成店老板。他和文彬等分散住在墩背、侯南等地。

1942年5月26日，郭潜在韶关被捕后叛变投敌，并引敌破坏了南委曲江交通站和粤北省委，先后捕去了粤北省委书记李大林、组织部长饶卫华和因太平洋战争爆发从香港撤回在乐昌的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主任廖承志等。6月6日，郭潜又引领中统特务头目庄祖芳及国民党广东省党部便衣特务、闽粤赣边区总司令部政治处少将主任林雁峰、大埔县党部书记长唐人等及武装匪特10余人一同到高陂来，配合高陂区署警兵，大肆搜捕共产党员，破获南委地下

机关，一时风声鹤唳、情势极为严重。

这天下午5时左右，我在校中刚吃过晚饭，有一些学生从高陂镇仓惶地跑回来说：秋三毕业班的刘学交，黄燕京两同学到高陂镇真真影相馆楼上取相片，碰到两名穿黑纱绸便衣裤，握着手枪的军警把他们扣留了。有人说是店主人经营什么不法生意，军警在那儿搜查、缉私，有的说是抓汉奸，同学们进去，便也一同被拘留了。听到这消息的老师，有几个已先行到高陂镇去了。我虽预感到可能会有不测的风云，但身为校长，学生出了事，自己怎能不去看看究竟呢？洗过了脸，便邀了总务主任余友林一同到高陂镇去。

学校离高陂镇约三里，走出了校门，迎面碰到两个从高陂镇跑回来的学生，形色异常恐怖；问他们镇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也不知道，走到半路，碰到一些往来的群众，也有的在互相谈论，说什么镇上抓汉奸，茶江旅店一次便抓了好几个……听到这些消息，我感到颇为蹊跷，心情分外地沉重。余友林跟在我的后面，一路上，彼此都没有说一句话。我准备迎接不幸的来临，义无反顾，正好象耶稣走向十字架似的一步步走到高陂镇来。

我和余友林首先来到校董主任丘启明的店里，许多人已围在他的身边，询问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周围的气氛异常紧张。抗战初期，国共合作关系较好的局势下，丘启明是表现得很进步的。但在近年来局势一天天恶化的情况下，他的思想动摇了，立场转变了。今天发生的事情，他是可能知道一些情况的，但他却板起神秘而严肃的脸孔对我说：“现在还是一个谜。”同时，他厉声地警告同学们不要到那危险的地带去；他对我的态度完全改变了，过去的热情和礼貌没有了，好象挺神秘似的。

我已猜到了事情的严重程度，这时，听说被扣留在真真影相馆楼上的学生已达10余人，连4位听到学生被扣而到真真影相馆楼上去查询的教师也很久没有出来，大概也是被扣留了。据说：最先进去取相片的两名学生被扣留后，其他同学上楼去查看的也一齐被扣留了。进一个，扣留一个，直到小小的楼房容纳不下了，再上去

的便被特务拿着手枪赶出来。影相馆的老板和其他店员也早被扣留了。

我和余友林从丘启明的店里出来，打算到区署去问问卢振英区长。恰巧这时，他迎面走来，阴郁的脸色使我一看就预感到事态的严重。他严肃地对我说：“唐书记长下来了，在德和旅店，叫你去谈话。”我估计敌特们早已在监视着我，有翼也难飞了。

到了德和旅店，唐人已楼下的一个客房里等我，露出一脸奸险的笑容招呼我坐下。我坐下后，话还没有谈起，两个穿着里纱绸便衣裤、态度严厉、身材粗犷的中年人，趾高气扬地从另一个客房里走出来，走到我的跟前，眼睁睁地看了我一刻，其中一个便装出温和的口气对我说：

“王校长，我们已清楚你参加了奸党组织，我们尊重你的才干，顾全你的地位，希望你自首。”

我早已猜想着的谜，果然如此残酷地在我的面前揭开了谜底。其实我思想上已有了一些准备，我不惊慌失措。迟疑了片刻，我坦然地说：“我一向是从事教育工作的，只知道为国家民族尽自己的一点力量，从来没有参加“奸党”组织，请你们调查吧！”

“不要狡辩，你狡辩也没有丝毫用处。我们尊重你的才干，希望你自首。”另一个便衣特务也帮腔作势地说。

接着，便衣特务拿了纸笔叫我把过去参加“奸党”的经过、担任过什么职务、同党线索现在机关和党员姓名住址等写出来。我装出莫名其妙的神态给他们写了一则启事，说明自己一向从事教育工作，从未参加“奸党”组织。他们看了后，板起凶狠的脸孔，大为不满。其中一个用食指狠狠地指到我的前额，愤愤地说：“好，你坚持不承认，看我们把你带到省党部去再说。”

“你要狡辩，就让我带你去看一个人吧！”另一个特务说。

我不知道哪一个同志被捕了及如何暴露了自己并出卖了我。但事情已经败露，却无庸置疑了。面对残酷斗争，我只好镇定着，准备承担任何的不幸……………

唐人无耻地对我说了一大篇威吓和诱降的话，妄想叫我坦白自首，简直是白日做梦！我沉默静静地坐着，当作没有听见他的话。

我料到一场悲壮的牺牲即将出现时，想到了组织、同志、学校、老师和同学们。不知道有多少同志被捕惨杀了，我感到十分的沉痛和愤慨。但革命火把是扑不灭的，一切也只好等待时间来回答。

过了一刻，两个便衣特务便把我和余友林押解到相隔不远的茶江旅店来。一上了楼，便有几个武装军警在森严地戒备着。二楼三个相连的客房内，拘禁着好几个被捕的同志。我和余友林被带进楼梯口的一个客房里来，里面有两张床铺。我们在外侧的一张床上坐了下来。内侧的一张床上已躺着一个颇为高大的中年人，时已薄暮，我看不清那是怎样的一个人，认识的还是不认识的。他听见有人进来，也不起身来看看，大家都悲愤地躺在床上，沉默着。门外就有警戒着我们的军警，是不允许我们交谈的。隔着木板的前后两个客房，也不知道还拘禁着多少人。大家都静悄悄地，只听得楼下的军警特务在忙来忙去，紧张的情绪说明事态的严重并在继续发展。

过了一刻，床上的那个中年人翻了一个身，我听到手铐触动的响声，接着，那个人的沙哑的嗓子好象在对我说话：

“想不到我们在这样的情况下再见！”

我敏感地听到了这熟悉的声音。他，就是我给他化名的王念之同志，去年3月下旬，黄芸同志要求我安排他在陂中休养肺病的；但他已于去年8月间恢复健康返回工作岗位去了，真想想不到他今天竟在这里被捕。刚才特务说要带我去看的一个原来就是他。无疑的，我的政治面目已完全被暴露了。

由于余友林跟我在一起，他是国民党员，思想是顽固的，因此，我不便和王念之谈话，而且警戒的军士就在门外，也不允许我谈话。

房子里静悄悄的，偶然听得见王念之的一两声叹息和喘气。

门外的军士在我们三个客房前后逡巡。这时，那个高个子——闽粤赣边区总部政治处主任林雁峰，带着满脸的奸笑走进我们房里来对王念之说：

“肚子饿了吧，吃过了吗？要吃什么？对我说吧！”

王念之没有做声。

我知道这些野兽总是这般假仁假义来掩饰他们反革命的本质的。但当他转过脸来看我时，却竟板起了阴险凶恶的狰狞脸孔，杀气腾腾地好象刽子手对待他刀下的羔羊一样，我却投以愤怒的眼色蔑视他，若无其事地静坐着。

我有点怀疑：林雁峰为什么对王念之这么客气而对我却这么凶狠呢？难道王念之已叛变投降了吗？我不敢想下去……

后侧的隔房里，拘禁着两个青年人，大约才 20 多岁。据后来了解，他们是丘鸿耀和王亚华。我房门外的走廊里，坐着一个老妈妈，年约 60 多岁，满脸皱纹，穿着破旧的黑灰色粗布衣服，也不知犯了什么“王法”，被拘禁在这里。前楼一个较大的客房里，拘禁着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双足盘坐在床上，坚定而沉着地在和一个坐在藤椅上的胖大的特务唇枪舌剑地辩论。据后来了解，那个中年人就是南委副书记张文彬，那个特务就是庄祖芳。张文彬同志的普通话说得很好，音调坚定清朗而有力。我听到他义正词严地对着庄祖芳说：

“个人的生死是毫不足计较的，共产党人决不怕死，怕死就不当共产党员。我们所关心的是国家民族。……国民党政府执行反动政策，实行法西斯独裁统治，消极抗日，积极反共，一再掀起反共高潮，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为亲者痛，仇者快。……国民党的最精锐部队——胡宗南部队，不但不到前线去打日本，反而部署在陕甘宁边区周围，企图消灭共产党、八路军，……你们甚至认贼作父，和日伪互相勾结；你们出卖主权，投靠美帝国主义，妄想靠美帝国主义来消灭共产党。……现在你们国民党内部是如何空虚、动摇，分崩离析，互相倾轧，……全国广大人民群众要求共产党领导抗

日，反对国民党执行反动政策，祸国殃民。……历史是无情的，谁也不能把前进的历史车轮扭转……，如果国民党人还有一点爱祖国爱人民的良心的话，就应该及早回头，悬崖勒马，赶快结束反动政策，和共产党真诚合作，争取抗战早日胜利，共同建设新中国；否则，国民党就只有走上自取灭亡的道路。……今天，全国的形势已十分清楚：人民的力量在不断壮大，国民党的反动势力在一天天削弱，且看三五年后，中国将是谁家的天下！……。”

张文彬同志掷地有声的说话，象一颗炮弹，投进敌人的心脏，炸得那个饭桶特务庄祖芳一句也不能回驳，只是恬不知耻地偶尔漫应几声。

我深深地牢记着张文彬同志的革命豪言，对他那种英勇无畏的顽强斗争的革命精神，内心感到无限的敬佩，更鼓舞了我的斗志；同时，为了他和许多被捕同志的未来而感到忧虑和悲愤。

入夜了，房里点了一盏鬼火似的菜油灯。一直到天亮，我和余友林横躺在小床上，外衣没有脱，一晚没有睡，彼此也没有说半句话，心情是十分沉重。

半夜后，楼下店子里闹洋洋的一片，好象有许多军警在忙着出发，大概那些野兽们又要到什么地方去围捕我们的同志吧？一刻儿，他们走了，旅店又静悄下来。

夜，好象是特别的悠长，门外的看守兵鬼魅似的时不时从窗口窥探我们的动静。我在担忧着外面的同志们，不知道在这附近，明天又将会发生什么更可悲痛的事！

第二天（6月7日），我们盼望得天亮了，情况还是一样的严重，外面的消息一点也不知道。

早上8时许，饭店里的工友给我和余友林送来一顿相当好的饭菜，据说是校董会叫他办好送来的，使我们美美地吃了一顿饱。

悠长的一天，被禁在旅店的楼房里，谁也不准来探见。到晚

间，余友林给校董会担保出去了。他是没有问题的，昨晚只因跟了我在一起，才弄得不能脱身；而我却是他们所要逮捕的主要对象之一。以后将如何，谁也无法预料。

房子里只剩下了我和王念之。这时，他沉痛地小声对我说：“前不久，郭潜被捕叛变，出卖了我们，暴露了一切。昨天是他带领特务到高陂来的。事情已十分严重，真糟！……你还年青，你要为革命保存力量，尽量设法蒙骗敌人，争取生存，坚定信念，等待时机……”。

他还告诉我说，他是昨天下午和交通员王亚华在高陂韩江岸边等候电轮准备到潮汕去的，想不到从梅县来的电轮在高陂靠岸时，郭潜和他引领的一大批特务一下电轮便发现了他和王亚华而将他俩逮捕了。我过去以陂中校长名义写给他的10多张空白了年月日和地点，必要时由他填写使用的通行证也被搜去了，他和王亚华被捕后，便被押回茶江旅店和张文彬、丘鸿耀、丘解老妈妈等拘禁在一起。

王念之的嗓子不好，说话声音沙哑，门外又有军警监视，我也不能多问。特务们知道他去年在陂中教过书，现在又搜到了我写给他的通行证，我和他之间的关系便很难辩说了。郭潜过去也来过高陂，对我和高陂一些较重要的同志他是认识的，清楚的。我感到情况已经十分严重。

一天到晚，旅店里仍然笼罩着恐怖的气氛，军警特务走来走去。晚上10点后，我和丘解老妈妈一同被押解到高陂区署的楼上来，军警们叫我坐在那里，不得走动。过了一刻，想不到昨天在真真影相馆楼上被扣押的两位陂中教师张新朋、罗鸿才和影相馆的老板蔡选英也被押解到区署来和我们合在一起。我和同事们相见了，大家都感到沉痛和愤慨，他们也是一天一夜被拘禁在影相馆楼上，一夜没有安睡。他们仅仅是进步教师，还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清楚我们的地下革命活动，只因关心学生，好心去询问究竟，便无端遭扣押，真感到十分的愤慨。